

陈建《通纪》书名与版本考

钱茂伟

摘要: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陈建《通纪》原著,考订出了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原著全称是《皇明通纪》,简称《通纪》;归纳了原刻本的八大特征;同时对“国图本”、“北大本”、“天一阁本”三个重刻本版本特征作了梳理。

关键词: 陈建;《通纪》;书名;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3-0044-06

一.《通纪》原著的发现

《皇明通纪》,简称《通纪》,是明朝嘉靖时代著名广东籍史家陈建(1497~1567)撰作的一部明史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明代通史著作,曾影响晚明史坛近百年。

《通纪》出版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时风靡于世。十七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皇帝一声令下,《通纪》板遭禁毁。从此,原版流传越来越少。万历以后,虽然出了不少重刻本或续补本,但多非原貌。自民国初年以来,《通纪》的原刻本被陈伯陶(1855—1930)、王重民(1903—1975)认为已经失传。民国初年,陈伯陶刊刻明清东莞陈氏名人著作成《聚德堂丛书》,目录列有《通纪》,但因找不到原刊本,只得放弃。难道《通纪》原刻本真的不传于世了吗?我于心不甘,从此,寻找《通纪》原刻本,成了我多年的一个业余爱好。整理出版原刻本《通纪》,成了我二十多年的一大愿望。

我接触陈建《通纪》,是1985年的事。那时,我随仓修良先生读研究生,准备主攻明代史学。谢国桢(1901—1982)《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多部续补《通纪》之作,他高度肯定陈建《通纪》的历史地位,称“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①。认为《通纪》是明代史学勃兴的起点。谢氏的这一精辟判断,成为我研究明代史学的切入点。于是,我从原杭州大学图书馆寻找陈建《通纪》。我找到的是岳元声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我努力想从中寻找陈建原著的影子。我又进一步找到民国《东莞县志》,

找到了由陈伯陶撰写的《陈建传》,找到了陈建《皇明通纪序》、《皇明通纪凡例》、《皇明启运录序》。于是,草成了一篇《陈建史学研究》稿子。原想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选题,但因为找不到原著,只得作罢。

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继续在寻找《通纪》原著。1988年,我在南京图书馆读到了《通纪》的前身《皇明启运录》。又在天一阁读到了《皇明资治通纪》、《皇明资治通纪全书》、《新铎校正标题皇明通纪》。1991年,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皇明通纪》残本。至此,我对《通纪》原著面貌有了初步的认识。于是,我发表了“陈建史学研究”四篇系列论文《陈建及其〈皇明启运录〉》、《〈通纪〉: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史著》、《陈建社会改革思想述略》、《陈建〈通纪〉及续补诸家略考》^②。此后,我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此事,总希望能看到原书面貌。

通过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了解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部朝鲜活字刻本《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一个42卷的足本。于是,我写信托时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一位学兄查阅。他来信说,目录上有其名,但书库无其书。再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也确没有著录此书。我相信此书已经失传,于是放弃了上北京大学阅读这部朝鲜活字本的愿望。大约到了2000年,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读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③,发现有此书的著录,且有编号,这才意识到此书仍存世。2002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首次看到这个本子。由于这是一个翻刻本,与原著内容是否完全一致,我心中没有精确把握。

1997年下半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了解到台湾的“中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收稿日期:2007-12-05

作者简介:钱茂伟(1962—),博士,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② 分别见《宁波师院学报》1992年1期、《浙江学刊》1994年1期、《宁波师院学报》1993年2期、《文献》1993年3期。

③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央图书馆”有一部原刻本。奇怪的是,目录著录为“东莞陈氏家刻本”,但标题却作《新刊校正皇明资治通纪》。我直观的感觉是,是编者弄错了,不可能是原刻本。但这个版本前编8卷,后编34卷,共42卷,符合我所认定的原著面貌,它不一定是原刻本,至少也是一个翻刻本,那是相当珍贵的,我渴望着早日读到此书。2005年上半年,受东吴大学邀请,我终得有机会上台北,看到了这部刻本的缩微胶卷。初步阅读的结果,惊讶地发现,这部书确是东莞陈氏家刻本。原刻本《通纪》的发现,使对我此前所见各种《通纪》版本有了全新的认识。2005年6月底回宁波后,立刻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报“《皇明资治通纪》整理”课题。同年12月,荣幸地通过专家的审议,成为当年度的直接资助课题。2006年9月,全书点校完成,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通纪》的全称

《通纪》的编纂经历过两个阶段,先是《皇明启运录》,后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皇明启运录》的始写时间不详,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广东东莞出版。目前,嘉靖原刻本《皇明启运录》仅南京图书馆有一部,4册,10行22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题“明录”,前有《自序》、《引据书目》。《皇明启运录》的版式,最大的特点是用了类似现代的关键词索引法。^①《皇明启运录》刊刻后,得到了好友黄佐(1490—1566)的称赞。黄佐从中获得灵感,劝陈建效法东汉的荀悦,把书续写到正德朝,成“昭代不刊之典”。陈建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又广搜材料,投入到了续写工作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皇明历朝资治通纪》34卷成。洪武三十一年姚广孝条中间有一注释,称“语在《启运录》中”,这证明开始《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独立的。《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完成后,陈建决定与《皇明启运录》合起来出版,前者称前编,后者称后编,但放弃了《皇明启运录》独特的关键词索引排版法。于是,形成了前后编名称不统一的《皇明通纪》。

陈建所撰的史著,简称《通纪》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全称是什么?陈建本人的用法不统一,自序及凡例,作“皇明通纪”,内文省称“通纪”。目录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版心题“明纪”;正文前编标《皇明启运录》,版心简称“明录”;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版心简称“明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皇明通纪”、“通纪”,三个名称,陈建本人都提到了。

同时代人或后代人用法也不统一。现在所见《通纪》全称有三种:《皇明通纪》、《皇明资治通纪》、《皇

明历朝资治通纪》。第一种称《皇明通纪》者,如同时代人杨慎(1488—1559)^②、邓元锡(1529—1593)^③。万历《粤大记》卷24《陈建传》有“《皇明通纪》,凡三十四卷”,而卷63《艺文志》作“《皇明通纪》二十卷,东莞陈建撰”。卜世昌补遗本称《皇明通纪述遗》。高汝栻本称《皇明通纪法传录》,序称“《皇明通纪》若干卷”,“陈东莞辑《皇明通纪》”。明人邓伯羔《艺榷》卷上《蔡邕、方孝孺、陈东有后》、明人徐三重《采芹录》卷3,均称“《皇明通纪》”。至于清人更多,如《明史·艺文志》也作《皇明通纪》27卷。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8《名媛诗》、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3、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15、潘天成《铁庐集》卷3、《皇朝文献通考》卷294、《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100、乾隆《贵州通志》卷34、《御定渊鉴类函》卷17,均作“《皇明通纪》”。近人谢国桢也用“《皇明通纪》”^④。第二种作《皇明资治通纪》。天一阁翻刻本,前后编版心统一称“皇明资治通纪”。卜世昌《皇明资治通纪全书》的《通纪》部分,卷名与版心均统一称“皇明资治通纪”。受此影响,岳元声订本也称《皇明资治通纪》。秀水人沈德符也称“《皇明资治通纪》”^⑤。第三种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仅台北“国家图书馆”本、北京大学翻刻本定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天一阁翻刻本则被定为《皇明资治通纪》。

笔者自80年代中叶以来,受岳元声订本影响,一直用《皇明资治通纪》。2006年7月写《天一阁藏〈通纪〉研究》^⑥一文时,忽然对“《皇明资治通纪》”产生怀疑,第一,陈建对此书的本称。陈建用了《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皇明通纪》,没有用过《皇明资治通纪》。也就是说,《皇明资治通纪》是翻刻者定的题目,是一个他称,可以撇开,重点要讨论的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和《皇明通纪》两者间的关系。第二,对陈建《皇明通纪自序》的重新思考。“继自永乐,下迨正德,……则今《通纪》具焉。……《启运录》旧已梓完,难以再编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并冠以《通纪》之名,而版刻姑仍旧,合前后共为一书。”“并冠以《通纪》之名”,那表示用后编《通纪》之名统括全书。考永乐至正德这段历史,正文称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陈建自序简称为“通纪”。将前编、后编合起来,也称“通纪”,这说明“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和“通纪”是相通的,“通纪”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的简称。第三,别人的称呼。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北京大学所藏朝鲜本时,称“总题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② 杨慎《升庵集》卷47《野史不可尽信》。

③ 邓元锡《函史》下编卷13《经籍记》。

④ 《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著述·焚通纪》,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⑥ 见《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页94—107。

① 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①。据以上三方面的考虑,我最后得出结论,“定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比较合适”。

2006年9月标点本《通纪》定稿时,我又对“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产生怀疑,考虑再三,改主“皇明通纪”。第一,原刻本后编版心题“明纪”,应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或“皇明通纪”的简称,“北大本”后编版心题“皇明通纪”正可佐证。目录“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后编,实际就是“通纪前编”、后编。《通纪》就是《皇明通纪》,“皇明”是可以省略的,如晚明史家朱国祯(1558—1632)《皇明史概》,习惯就省称《史概》。如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全称,《皇明通纪》是简称,而《通纪》则是省称。第二,“北大本”书沿明确作“明通纪”(见图一)。书沿上的“明通纪”三字,应是刊刻时加上的,不是后人做的。朝鲜是半独立的宗主国,所以去掉了“皇”字。第三,在同时代与后人所用三个名称中,《皇明通纪》使用最早,使用最多,其次是《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最少。明朝人书名讲究简洁,《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做书名显然太长,《皇明通纪》就简明多了。

虽然确定以《皇明通纪》作标点本书名,但由于没有看到原书,我并不敢完全确信,题目问题始终成了我的一块心病。2007年4月底,我托台北的学生调阅了原刻本,希望看到《皇明通纪》这个书名,然而没有要找的内容,但增加了一条重要信息,后五册有“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标签,且是按十二地支排列的。但我以为这是后编的题目,故仍坚持使用《皇明通纪》。9月底,中华书局于涛先生对初稿《前言》中的“《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全称,《皇明通纪》是简称,而《通纪》则是省称”提出疑问,他的拷问让我的心彻底不安。于是,再次托在台北的学生调阅原刻本,然而仍一无所获。10月底,我到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顺利地调阅原书,看到了这部两函12册的明版书。首先让我惊讶的是素绿小白点封面,与习见的嘉靖刻本常用的蓝色布面大异,而且整部书保存相当完好,一点不缺。我问特藏部主任:“封面是否是馆里所加?”她回答:“应是原版封面,至少也是曾拥有此书的收藏家所加。”接着,我仔细看书沿与封面,希望找到标题。然而翻遍整部书,没有我要找的标题。倒发现一个现象,第六册开始,各册扉页有书名标签。观其字迹,恰与正文相同,由此可判断,标签应是原刊所加。第六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永乐纪,巳”,第七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洪熙纪、宣德纪,午”,第八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正统纪,未”,第九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景泰纪、天顺纪,申”,第十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成化纪,酉”,第十一册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弘治纪,戌”,第十二册为“皇明历朝资

治通纪,正德纪,亥”。见图二。

标签的共同特点是,上栏统一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大写;下面为不同的年号纪,小写。下栏为十二地支名称,应是册数,全书十二册,正好与十二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可惜的是,前五册扉页没有这样的标签,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本来就没有,如前四册;二是标签条掉了,如第五册。笔者翻检原书时,发现第八册、第十册的标签条夹在第五册中,没有贴在第八册、第十册的扉页上,第五册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从所见后编标签风格来推测,第五册应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革除靖难纪,辰”,前四册应是子、丑、寅、卯。从上栏统一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来看,此书应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此书第一册后有“中央图书馆善本藏书”标签,就题“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说明早有图书馆专家将此书定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至于此书的缩微胶卷封面上有一行用黑炭素笔写上的“新刊校正皇明资治通纪四十二卷”,显然是编目人员题上的,寻遍此本正文,没有“新刊校正皇明资治通纪”字样。经我的提问,该馆古籍部重新查检,证明是与编号01893的明末刊本混淆了,现在目录已更正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至此,题目问题似可告一段落。回宁波后,我兴奋地告诉于涛先生,决定改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然而,电话搁下后,我又对“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怀疑了,觉得还是“皇明通纪”合适。第一,前五册标签没有看到,虽可以肯定是“子、丑、寅、卯、辰”五册,但焉能确定名称必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尤其是前四册,可能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启运录,子”、“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启运录,丑”、“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启运录,寅”、“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启运录,卯”。朝鲜本书沿标“明通纪,启运录”,似也可以旁证这种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皇明启运录,洪武纪,子”、“皇明启运录,洪武纪,丑”、“皇明启运录,洪武纪,寅”、“皇明启运录,洪武纪,卯”。只有前五册扉页标签上看到了“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才可以断定全书标题统一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第二,目录虽然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似乎统一使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了,但扉页与正文卷帙标识上并没有体现出来,所见后编扉页标签仍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各卷也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之…”,而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之…”。第三,如上所说,陈建本人自序与凡例均作“皇明通纪”,同时代及后人较多地使用的是“皇明通纪”。第四,接近原书风格的朝鲜本书沿明确作“明通纪”。第五,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明通纪”共有53条,“皇明通纪”共有12条,而“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则一条也没有。目前所见数据,“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使用最少,仅两家图书馆,且是20世纪人使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用的。明清时期,用的最多的是“皇明通纪”与“通纪”。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全书名称用“《皇明通纪》”更妥。

此说的麻烦是,陈建原著封面上没有出现“皇明通纪”字样,仅在自序与凡例中出现,倒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在后编扉页中出现了。那似乎是表明,书名用“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更合适。但前所述明清时代人征引陈建原著名称的数据显示,“皇明通纪”或“明通纪”、“通纪”更多,“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反倒没有。这种矛盾现象,惟一合理解释是,“皇明通纪”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的简称,至于“通纪”则是“皇明通纪”的简称,这三个名称应是相通的。总之,作为正式书名,“《皇明通纪》”比较合适。

三.《通纪》原刻本特征

《通纪》原刊本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失传,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台北“国家图书馆”的《皇明通纪》应是现存惟一嘉靖原刻本。此书第一册首页有“言言斋善本图书”章。考“言言斋”为上海周越然的藏书楼,则此书原为周氏藏书。

从“台湾本”来看,原刻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1) 板框高 20 公分,宽 12.8 公分,上栏高 1.3 公分。

(2) 前面有皇明通纪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采据书目、皇明通纪凡例。版心题“明纪”,证明是后来加上的。

(3) 题名不一,前编称皇明启运录八卷,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34 卷,总共 42 卷。各册扉页有独立的标题。

(4) 署名方式不一,皇明启运录题“粤滨逸史清澜酌叟臣东莞陈建辑著”,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题“东莞陈建辑著”。

(5) 版心不统一,前编刻“明录”,后编版心刻“明纪”,双鱼尾,白口。

(6) 版式前后字行数不统一,前编 10 行 22 字,后编 11 行 22 字。

(7) 字体为方方正正的仿宋体,横轻竖重,比较扁平,行格疏朗。

(8) 部分内容校勘不精。有较多的错字、漏字或衍字。各卷标题不统一,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一般作“卷×”,但卷之 15 与卷之 21 却多“之”。多处文字排成双行小字,可能是漏排造成的。个别地方有排版错位现象,如后编卷 24 成化二十年秋“东厂太监尚铭有罪,褫职,以太监陈准代之”条,下面括注“此条当在前”。这些随意性、不规范性,正是原刻本才会有的现象。而“采据书目”有三处挖刻痕迹,这是家刻本舍不得花钱别刻的表现,证明是陈建家刻本。台湾本著录为“东莞陈氏刊

本”,没有给出理由,此可左证之。

这次整理,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提供一个正宗的《通纪》版本。如前所述,各色名目的《通纪》版本很多。关于《通纪》及其续补诸本的版本问题,我早在 90 年代初已经做出详尽研究,我的研究成果尽管发表在《文献》杂志上,但显然没有引起图书馆界足够的重视,影印者不知道各版本间的源流关系。结果,当下所见各种《通纪》影印本都是出入较大的续补诸家,真正接近原貌的翻刻本没有影印。甚至,这些疑似版本的存在,不仅不能让读者看到《通纪》原刻本的面貌,反而成了《通纪》原刻本问世的障碍。二是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方便的阅读版本。我对明代史学做过二十多年的全面研究,在我看来,《通纪》是明朝一流的史学名著。仓修良先生接受了这一观点,在 2004 年底修订《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时,毅然将之列入中国史学名著增补名单^①。在这种情况下,出一部标点整理本,与《中国史学名著评介》配套,从而让更多的读者阅读是十分迫切的。影印虽方便,阅读不便,标点本是现代版,更适合现代社会。

当我提出出版整理《通纪》原刻本的时候,有出版社编辑就问,这个版本与其它影印的《通纪》有何不同?有必要重新出版吗?这个问题问得好。除了版本价值、史学史研究价值外,《通纪》内容是否有重新整理出版的价值,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影印的发展,已经有多部续补本《通纪》问世。据笔者所知,《续修四库全书》收进了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高汝栻《皇明通纪法传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进了《通纪述遗》,《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了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岳元声《皇明资治通纪》。在已经有大量《通纪》续补本影印的时候,要不要将原刻本《通纪》整理出来,开始我也吃不准。虽然我研究《通纪》思想及版本二十年,但由于一直没读到原刻本,没有做过原刻本与续补本内容比较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原刻本内容有没有独立存在价值。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做一个比较研究。在标点校勘的时候,我拿来比较接近原著的岳元声订本《皇明资治通纪》、沈国元《皇明从信录》、高汝栻《皇明通纪法传录》,就同一内容进行比对,结果发现,这些续补本与原刻本出入相当大,可以说,续补者将原刻本《通纪》改得面目全非,不仅条目有删除,尤其是陈建的议论与引文部分被后人删除了。而这部分内容是研究陈建思想与明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数据,没有了这些部分,《通纪》的价值大打折扣。我进一步注意到了《通纪》的历史叙事学价值。我以前研究《通纪》的时候,由于没有读到原著,只注重史论部分,没有认真阅读内容。这次通过校读,仔细阅读了全书,才感觉到此书确实编纂成功。表现为,思

^① 钱茂伟撰“《皇明资治通纪》”条,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 2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想性强,主线明确;叙事生动,对话相当多,可读性强;评说恰如其分^①。《通纪》确实具备了史学名著的条件。从而,我更加坚定了校勘、整理《通纪》的信心。

四.《通纪》的遭禁与重刊

1.《通纪》的遭禁

《通纪》出版后,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用《万历武功录》作者瞿九思(1545—1615)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说,“国家聳聳,至是始有目有耳”^②。“向来俗儒浅学,多剽其略以夸博洽,不一而足”^③。由此可见,《通纪》在当代史“书荒”年代的独特影响。

《通纪》首刊于广东,很快向北渗透。到了嘉靖后期,大约遍布了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南直隶等长江以南地区。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隆庆五年(1571)的十七年间,正是原刻本《通纪》正常销售的时代。由于这是一个家刻本,没有书商的运作,故而传播空间仍是有一定限度的,但还是引起了北方统治者的注意。陈建死后四年的隆庆五年(1571)九月,工科给事中李贵和上书皇帝,告发了《通纪》,称“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奉旨纂修,藏在秘府。(陈)建以草莽之臣,越职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矣。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欲以一人闻见,臧否时贤,荧惑众听。若不早加禁绝,恐将来讹以传讹,为国是之累非浅浅也”。疏下礼部复议。礼部“请焚毁原板,仍谕史馆毋得采用”^④。穆宗同意了礼部的决议,《通纪》原板被毁。

2.《通纪》的翻刻

禁书越禁名声越大,这也是规律性现象。《通纪》成为禁书后,实际上由政府出面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引起了全国人更为广泛的注意。沈德符讲到《通纪》遭禁以后,“海内传诵如故也”,至万历时代“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⑤。所谓重刻,就是按原著卷帙重新排版。由于陈氏家藏板刻被销毁,于是,就有书商开始重新翻刻《通纪》,从而出现版权转移现象。经由书商的市场操作,销售力度显然更大,于是,《通纪》的影响面进一步扩大。从时间上说,应该是万历初年的事。重刻本的特点是,内容上与原刻本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排版格式。没有双行小字,字体也不同。

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有一部残缺的翻刻本。由于缺第一册,没有自序、目录、凡例,所以,国家图书馆编者不知是同一部书,将前、后编分割为两部书,分别称

《皇明启运录》、《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称“皇明启运录”,版心题“明录”,10行22字,残存卷3至8,已经影印入《稀见明史史籍辑存》^⑥。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版心题“明纪”,11行22字,残存卷1至卷11,卷15至29。原书42卷,12册,残存32卷,9册。这个版本的风格与台湾本版式相同,我原来的看法,这是一部原刻本。最近亲自看过台湾原刻本以后,看法改变了。经我的比对,台湾原刻本书框高,纸张白而厚;而这个版本的书框高度短一些,纸张质量黄而薄,接近坊刻本所用纸。由此可判断,这应是一个翻刻本。此书没有标“新刊”字样,与原刻本相同,姑将之定为最早的翻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京城活字本《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具体的刊刻年代不详。据李竹仙主编的《古代朝鲜文献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书用的是“乙亥字”^⑦。“北大本”前后编统一为10行18字。著录17册,实际后编缺1册,即卷15、16、17。前有皇明通纪序、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采据书目、皇明通纪凡例。正文,前编称“新刊皇明启运录”,版心题“皇明启运录”;后编称“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版心题“皇明通纪”。经我的比对,有几卷漏刻“东莞陈建辑录”,上栏的关键词也漏了不少。此书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题为《明通纪》。北京大学图书馆将朝鲜活字本定名《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的直接依据,不外是目录所谓“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其实是错误的。一定要按目录定名,也应称《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而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此书的书名,应按书沿名称,称《明通纪》比较合适。二是前后编版心不统一,但名称又不同于原刻本,而且书沿“明通纪”各册后标皇帝名称,说明是一个非常接近原刻本的翻刻本。三是大开本。版框高23.1公分,宽16.5公分,是笔者所见最大的一个《通纪》版本。

“天一阁本”前有皇明通纪序、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采据书目、皇明通纪凡例。正文,前编称新刊皇明启运录,后编称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后统一排版为12行25字,单鱼黑口。存前编8卷,后编卷1至16,卷20至29。原书12册,残缺2册。蓝封面。天一阁所藏翻刻本,时间应在万历初年,主要根据是字体略偏长,字迹清秀,版面清楚,印刷质量明显提高。一般说来,嘉靖时代的本子,印刷质量不高,字迹略粗,版面偏黑。惜不知这翻刻本出于何地?从刊刻质量与现存本藏地来看,应该是浙江。这个版本,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12册,适与“台湾本”、“国图本”

① 钱茂伟《〈通纪〉历史叙事的特点与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② 民国《东莞县志》卷58《陈建传》引。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著述·焚通纪》。

④ 《明穆宗实录》卷61,隆庆五年九月辛巳。

⑤ 《万历野获编》卷25《焚通纪》。

⑥ 线装书局,2003年。

⑦ “乙亥字”是指朝鲜世祖元年乙亥年(1455)铸造的铜活字体,有大小两种。

相同。二是此书版心统一称“皇明资治通纪”，据此，《新编天一阁书目》将此书定名为《皇明资治通纪》。如果这个名称符合原意的话，那是将陈建书定名为《皇明资治通纪》的开始。三是前、后编版心名称统一，说明晚于“北大本”。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部后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13卷，存第8册卷12至14，第10册卷20至24，第12册卷30至34，共3册。此书是原刻本或翻刻本，因未见原书，暂系于此。

南京图书馆有一部《新刊皇明启运录》，42卷。“四十二卷”，这应是《皇明通纪》翻刻本卷帙，而不应是《新刊皇明启运录》的卷帙。既称《新刊皇明启运录》，自然应是一个翻刻本。惜不得见，也不知有否有后编。

值得注意的是，自“北大本”、“天一阁本”以后，出现了两个方面的不同现象：一是陈建《皇明通纪自序》

“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度支恒忧匱乏也；祖宗时法度昭明，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均被省作“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二是《皇明通纪凡例》第七条，原刻本作“此纪编年虽终于正德之季，然今嘉靖中我圣天子有徽猷美政，先朝所未及行者，因事类录备书，垂法万世，此固史家一例也。”而翻刻本以后版本，第七条均作“韩子云：‘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今学者博古或有之，而通今殆鲜。以群籍焚而无统，考索惟艰也。今芟繁会要，统为此纪，庶几便士子通今之略，工拙不暇计云。”民国《东莞县志》卷84《艺文略》收录的自序及凡例，正是后一种版本。何以《自序》及《凡例》出现两种版本现象？最大的可能是翻刻本翻刻时出现误差，以后的版本，均沿翻刻本而来，以讹传讹，于是出现后一种版本一边倒现象。

图一，“北大本”《明通纪》书沿；图二，“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标签；图三，“台湾本”《皇明通纪》卷首；图四，“国图本”后编卷一；图五，“台湾本”后编卷一；图六，“北大本”《明通纪》内页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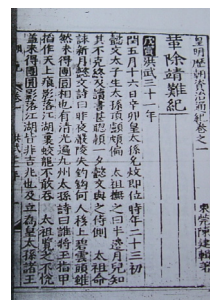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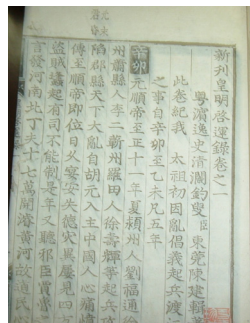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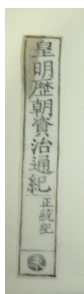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A Study on the Book Title and Editions of CHEN Jian' Tongji

QIAN Mao-wei

(History Depart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of Chen Jian's Tongji newly discovered, this article checked out the full title of the book as Huangmingtongji at early time, later Tongji for short, and summed up eight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al edition, while making an inductive summarization into the features of Guotu, Beida and Tianyige three editions.

Key words: Chen Jian; *Tongji*; book title; edition

(责任编辑：黄云鹤)